

创作谈

它顽强生长，有自己的意志

关于我的最新长篇小说《应物兄》

李洱

作家李洱花13年时间，完成了90万字的长篇小说《应物兄》...

“13年中世界沧桑剧变，我个人生活也发生很多的变化，心境非常苍凉。写这部小说我还是30多岁满头青丝的年轻人，写完已经是年过五旬两鬓斑白的老人，再回到江南已经没有以前的形态了。”

在一次关于《应物兄》的研讨会上，李洱这么说。而在本期文艺百家刊登的这篇创作谈里，李洱讲述了这部小说诞生的过程。

——编者

2005年春天，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我动手写这部小说。

当时我在北大西门的畅春园，每天写作八个小时，进展非常顺利。我清楚地记得，2006年4月29日，小说已完成了前四章，计有十八万字。我原来的设想是写到二十五万字。我觉得，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合适的篇幅——这也是《花腔》删节后的字数。偶尔会有朋友来聊天，看到贴在墙上的那幅字，他们都会笑起来。那幅字写的是：

写长篇，迎奥运。我不喜欢运动，却是个体育迷。我想，2008年到来之前，我肯定会完成这部小说，然后就可以专心看北京奥运会了。

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完成当天的工作准备回家，突然被一辆奥迪轿车掀翻在地。昏迷中，我模模糊糊听到了围观者的议论：“这个人刚才还喊了一声完了。”那声音非常遥远，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稍微清醒之后，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后来，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他们一句话也不说，硬要把我塞上车。那辆车没有牌照，后排还坐着两个人。我拒绝上车。我的直觉是，上了车可能就没命了。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在医院检查身体，能否回来一趟？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攫住了我。当天，我立即回到郑州。母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的腿怎么了？”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陪着父母无数次来往于济源、郑州、北京三地，辗转于多家医院，心中的哀痛无以言表。母亲住院期间，我偶尔也会打开电脑，写上几页。我做了很多笔记，写下了很多片断。电脑中的字数越来越多，但结尾却似乎遥遥无期。

母亲病重期间，有一次委婉地提到，你还是应该有个孩子。如今想来，我对病痛中的母亲最大的安慰，就是让母亲看到了她的孙子。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什么叫死。世界彻底改变了。

母亲去世后，这部小说又从写起。几十万字的笔记和片段躺在那里，故事的起承转合长在心里，写起来却极不顺手。我曾多次想过放弃，开始另一部小说的创作，但它却命定般地紧抓着我，使我难以逃脱。母亲三周年祭奠活动结束后，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我打开电脑，再次从头写起。这一次，我似乎得到了母亲的护佑，写得意外顺畅。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常常以为很快就要写完了，但它却仿佛有着自己的意志，不断地生长着，顽强地生长着。电脑显示出的字数，一度竟达到了二百万字之多，让人惶惑。这期间，它写坏了三部电脑。但是，当朋友们问起小说的进展，除了深感自己的无能，我只能沉默。

事实上，我每天都与书中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随形。我有时候想，这部书大概永远完成不了。我甚至想过，是否就此经历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我为什么写不完一部小说》。也有时候，我会这样安慰自己，完不成也挺好；它只在我这儿成长，只属于我本人，这仿佛也是一件美妙的事。

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催促，如果不是意识到它也需要见到它的读者，这部小说可能真的无法完成。今天，当我终于把它带到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有安慰，也有感激。

母亲也一定想知道它是否完成了。在此，我也把它献给母亲。十三年过去了。我想，我尽力了。

(作者为知名作家)

名家新作的集中亮相，点亮了2019年开年的各大文学期刊。回想起1990年代末文学期刊经历的那一场低谷，从大范围地被“断舍离”，到如今重获生机，文学期刊做对了什么？又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为可能成为经典的文学而存在

施战军

名家新作的集中亮相，点亮了2019年开年的各大文学期刊。文学期刊在当下的勃勃生机，由此可见一斑。回想起1990年代末文学期刊经历的那一场低谷，人们不禁要问：30年间，自衰而盛，文学期刊做对了什么？又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本期文艺百家，刊发知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的评论文章。在他看来——

有时时代担当的文学期刊，没有义务为作者存在感而不顾真切的现实感；

文学期刊当为那些在时代中产生的有可能成为经典的文学而存在，而不是为那种短时热闹一晃而过的有快意而没有多少深意的文字、有才气却一味恃才使气的写手而忙碌。

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这一时段，曾经是文学期刊的低谷期。与其说是经济大潮袭来影响了文学报刊的发展，莫如说是文学园地因其产业化自营能力虚弱而被“断舍离”了，当时的说法是“断奶”。办刊经费被大大缩减、有许多杂志社甚至连人员工资也被完全取消，文学期刊被放逐市场去自谋生路。彼时笔者写过《刊情是一面镜子》的小文，谈对文学杂志改刊和停刊现象的看法。

当时，很有历史的《湖南文学》改成了《母语》很快又因为无法自营而停掉（2005年以《文学界》为名重新出现，2012年才得以恢复为《湖南文学》，复刊第一期的头条是后来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王跃文的短篇小说《漫水》），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内很有水准的《东海》停刊，《西湖》改为《鸭嘴兽》等等，这些状况一时令人心绪复杂。

与如今首要注重社会效益的状况相比，那时以产业化能力看取而不是当作文化压舱石的价值来衡量文学，导致了文学期刊生存与发展的普遍危机。好在那种境况存在的时间并不太长。

上面说到的《西湖》，1959年创刊，也算老资格的文学杂志，在世纪之交改为综合文化类的《鸭嘴兽》，并没有收到理想中的影响和收益。随着文学与文学期刊重视，这些年恢复原名的《西湖》已经满血复活，在今日的文坛口碑颇佳，被公认为80后90后文学新锐的大本营。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文学期刊在时代发展中的一个代表性例证。



王蒙中篇小说《生死恋》首发于今年第一期《人民文学》



叶兆言新作《应天府》首发于今年第一期《花城》



冯骥才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首发于今年第一期《当代》

《人民文学》杂志今年将与共和国一同迈入70周年的历史进程。近年来，我们倾力下力抓现实题材，让文学期刊呈现“深扎”的最优成果，表现新时代人民生活和国家民族在巨变中协调发展前行的丰富多彩；文学新人的发现和作品中新人形象的呈现也是我们组稿的重点。增强亲和力，提高艺术品，从内容的厚重清新到技法的讲究出彩、从栏目设计的适时调整到外封内页的精致追求，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就会得到读者的好评和喜爱。新开设的“新时代纪事”，发现和聚拢文学新人的“新浪潮”“90后”等栏目收到了热烈的反馈。作为传统优势栏目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每年的中国文学佳作盘点《人民文学》都占有醒目份额；新世纪后开始的长篇小说栏目，首发原创长篇小说总是备受瞩目并能在各种奖项和排行榜上取得佳绩。无论是我们的读者还是我们的来稿都在不断增加，这都是文学期刊回暖的证明。

新繁荣得益于新时代，挑战也来自时代的新要求。前瞻性引导创作、严谨细心的编辑出版流程，是专业性文学期刊的精品化优势，也是专业性文学期刊的命脉。如果在全媒体面前一味迎合受众面的扩张，会将这一命脉断绝。

文学期刊是为那些在时代中产生的有可能成为经典的文学而存在的，不是为那种短时热闹一晃而过的有快意而没有多少深意的文字、有才气却一味恃才使气的写手而忙碌的。文学期刊跟耐心沉思的作家和读者、跟耐

读传世的作品相互取暖彼此为伴。这个时代的温度，在民族复兴、文化自信、生态文明等新时代稳健运行的理念和践行中，在无限丰富的人民生活中。新兴媒体可以每天都去蹭热度，但是专业性的文学期刊，贴近体恤并会意的是时代与人的温度，这个温度属于时代也属于更长远历史，属于我们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国家民族和人类。

在全媒体热潮中的降低门槛甚至取悦俗化的倾向，给今天的文学刊物带来的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和1990年代末期是有相似性的。那个时候很多文学期刊的失败转型，其实就是在迎合中不惜试错，而不是在坚持中有效调整的结果。

比如文学期刊作品的特色之一，是规范的母语和最富表现力的精到的文字，她无法容纳过于随意放纵甚至粗鄙恶俗的语风语体，因而，有亲和力与表现力的表达后面是母语的严肃性，在让母语不断丰富和活跃的同时，也要怀着责任保护母语的尊严。服务大众，但专业标准丝毫不可放松。这些也是文学期刊的天职。

在当前，许多具体又切实的问题，还需真正用心用力思考、面对和解决。比如惯性滑行的老化思维如果不破除，如果没有对新时代的人民生活深入了解和深刻体察，我们的方向、心思、趣味和品相就会与人民和时代的要求形成错位。

以我们收到的许多乡村题材来稿为例，其中不乏名家新作，貌似写的是现实，可内容几乎就是十年前的老

套路，有的连村主任不叫村长的事都不清楚，庄稼如何农具怎样不涉及，农民怎样干活未可知，扶贫脱贫只当没有，地域特色语焉不详，更缺乏《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在80多年前谈乡村文学时就曾指出的“经济民俗事象”。满纸的兴味只集中在权谋男女非死即伤，此种闭门造车的虚妄想当然之作，巧遇不思精进的懒惰编辑，很可能会将其视为“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力作”。可对较真的编辑和时代担当的文学期刊来说，是没有义务去为作者刷存在感而不顾真切的现实感的。

当然，代承伟大的文学传统，在根性坚实的基础上容纳新的艺术探索，在新语境中，以文学的眼光开掘更加鲜活的生活与想象的空间，更新内容和题材，拓新更为高妙的叙述方式，一直是位于正典文坛前沿的文学期刊理应承担的审美感应。

这大概也关涉我们面对自身和稿源的新问题新挑战：既要注重文学的人民性与真切的现实感，又要保证文学作品的艺术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而实际的课题。文学期刊必须与时俱进，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有筋骨有温度，与人民共感、与时代风雨同舟，鼓励人物和故事具有地气丰沛的现实感和现实力量的创作，和百姓的欢乐忧伤同心共振，并充分尊重艺术规律，发表更多能够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力作。

(作者为知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

影像社会学

超大型城市何去何从？

——从正在上映的科幻片《掠食城市》谈起

陈剑

新西兰的大导演彼得·杰克逊（《魔戒》三部曲、《霍比特人》三部曲）最近监制了一部情节设定在未来一千年之后的奇幻电影《掠食城市》。该片的导演克里斯蒂安·瑞沃斯可以称得上是彼得·杰克逊的徒弟，曾经担任《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系列的视觉特效，也曾凭2005年《金刚》一片赢得了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这次师父监制、徒弟导演的大片效果如何呢？

这部电影最大的噱头就是移动城市的设定：在2118年，人类社会爆发了大战，几乎摧毁了全部文明，幸存下来的人类分成了两大阵营：拖拉机派和反拖拉机派。

所谓拖拉机派，就是以内燃或者蒸汽作为动力的造型为巨大拖拉机的移动城市，片中原名为Traction，有影评人直译为牵引系统，与拖拉机(Tractor)的词源同根，就称为拖拉机派更加形象。拖拉机派的代表是新伦敦城，这个庞然大物大约有1.5公里宽，2.5公里长，将近一千米高。在战争爆发之后的一千年，新伦敦越

过英吉利海峡的大陆桥，来到了曾经的欧洲大陆上游荡，吞噬更小的城镇和城市，夺取它们的金属、燃料、食物和人类劳动力。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小城镇被吞噬，新伦敦也面临着资源不足的问题，这时他们的新领袖瓦伦丁获得了古人的高科技武器，打算向东入侵山国，打破一千年未曾失陷的高墙壁垒。而山国，正是反拖拉机联盟的盟主。山国的文明，是在固定的定居点上修建城市，并且修筑一公里高的城墙来抵御掠食城市的侵袭。

影片中的新伦敦，显然是城市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不断吞噬小城市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口资源。比如日本，虽然面临着整体人口下降的压力，但是东京的人口依然在增加，而周边农村和中小城市的人口却在加速减少，日本政府不得已推出了“给钱搬出东京”，“搬去小镇送房子”等政策，最近在一部名为《羊之树》的影片中，还假想让犯人提前释放，去补充小城镇的劳动力。

城市化何去何从？是像日本、拉美国家一样走超大型城市化之路，还是建立像欧洲、北美国家一样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现在尚未定论。毋庸置疑，城市的规模对于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同类行业的经营者聚居在城市中也可以达到更大规模的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同时，不同行业的企业也会拥有不同的竞争优势，使得城市间贸易有利可图。这就是传统城市经济学的三个城市发展的基本理论：规模经济、聚集经济、和比较优势。

但是城市的发展并非是无止境的，要受到自然地形、资源（水、电、气）、交通成本、居住条件的限制。在城市发展初期，边际效益高于边际成本，城市的继续扩张是有利的；而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边际成本最终会超过边际效益。再继续城市的扩张，就会“得不偿失”。清华大学郑思齐教授2012年的著作《城市经济学的空间结构-居住、就业及其衍生问题》提到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中小城市还远远没有达到“最佳规模”，而某些超大型城市则已经跨过了“最佳规模”的拐点。一旦跨过了这一拐点，同时又是单一中心城市模式，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城市病。

城市的多中心化，或许才是解决这些超大型城市的“城市病”的药方。



《掠食城市》最大的噱头就是移动城市的设定：在2118年，人类社会爆发了大战，几乎摧毁了全部文明，幸存下来的人类分成了两大阵营：拖拉机派和反拖拉机派。图为《掠食城市》剧照

苏州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苏州1062.57万人，2018年上半年GDP达到了9100亿元。可是从房价的角度来看，最近一期搜房网发布的《2018年12月中国房地产价格指数》，苏州的新房均价为1.6万元/平米。就居民收入及房价而言，苏州显然比一些同类型、同人口规模的城市更为宜居。

是什么导致苏州的高收入，和相对的低房价呢？城市设计时的多中心化，或是其宜居的主要原因。苏州的整体城区，由以苏州古城为中心的旧城区、西北边的高新区、和东边以金鸡湖为中心的工业园区组成。旧城区以旅游、传统

工业为主；新区则是现代工商业、金融、及文化产业集中的城区；工业园区是和新加坡政府合作的高新产业区，是苏州收入最高，因而也是房价最贵的地区。由此可见，苏州的发展，成功地摆脱了其他城市“摊大饼”式的无序对外扩张，因此也部分避免了高房价、拥堵等现代化的恶疾。

当然，城市的发展，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除了城市的规模，还包括产业的差异化、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合理的税收等等，但是在现有模式上一味发展超大型城市，绝不是城市化的未来之路。

(作者为计算金融学博士、影评人)